

从“中国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讲义
系列第二讲

第二讲

从“中国的现代化”到 “中国式现代化”

二〇二四年十月

本讲目录

引言

上部：中国的现代化传统与现代

一、帝国伤口

二、精英崛起

三、现代试验

四、政体变革与资本主义道路

五、国家统一与官僚资本主义道路

六、社会革命与共产主义道路

七、重构国家

下部：中国式现代化

八、政党领导

九、小康社会

十、社会主义

十一、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十二、天人合一

十三、人类命运共同体

十四、中国模式

本讲小结

第二讲

从“中国的现代化”到 “中国式现代化”

引言

今天，我们踏着第一讲提出的“一分为三”的脚步，进入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体会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逻辑力量的伟岸与强大，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只有摆脱西方柏拉图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才能形成对现代化的理性判定，研究现代化的哲学基础不是一分为二，而是一分为三。消极的悲观与盲目的乐观均不可取，理性、冷静的态度是“直观”，就中国而言，其宏观历史、微观历史以及中观历史一饮食史、科技史、服饰史、艺术史、改造自然史、农业史、植物与动物驯化史等，都包含着中国智慧、中国理解，中国内涵，中国意义以及中国关怀，特别是那些外语不能翻译而须要直接采用汉语拼音来翻译的专业概念与词汇，他们是体现中国文化和中国现代化特性最为直观的表征一例如京剧”、豆腐、单位、关系，天、道、大一统等，以后英语中解读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现象的中文拼音词汇可能会越来越多，因为体现中国文化和中国现代化之特性的很多词汇，在英语中并没有与之对应的词汇。

一个能够用一道菜，一幅画，一盆景将宇宙之美艺术化地呈现在一个微小空间中的民族，其对宇宙终极法则的理解能力一定是非常强的，虽然中国人没有像李约瑟(**Joseph Needham**)所说的那样发展出近代科学，但是中国

京剧曾有英文译名为Baijing Opera,但并不能表现其意蕴，之后只能用汉语拼音表达其意思。

人学习现代化、践行现代化的能力超凡绝伦。不难发现，世界上学习能力最强的民族之一就是中华民族，虽然自近代以来，在自然科学领域中，中国人的原创能力没有像西方世界那样喷涌而出，但中国凭借超强的学习能力弥补了这一短板，缩短了这一距离，所以，中国的现代化既不是源于单纯的外部刺激的产物，也不是一厢情愿的中国中心观的产物，而是中国人将外部压力，经过创造性的实践，转化为自主行动，自主探索的结果。以这样一种一分为三的哲学工具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性，才能跳出极化思维和二元对立的世界，确立一种理性而又冷静的理解进路，

今天这一讲就是基于这样一种平和、理性、冷静的思路，来分析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与模式。我们分上下两部分进行讲解，上部“中国的现代化”讲述的是中国的现代化历史，其中主要包括动因，起点、过程，路径、学习和借鉴等，下部“中国式现代化”主要揭示历史变迁与历史突破背后的逻辑与规律，主要包括形态(pattern)，框架(framework)，模式(model)，道路(road)、体系(system)，制度(institutions)、轴线(axis)等。

上部：中国的现代化

我们试图通过七个命题来理解“中国的现代化”。(1)帝国伤口：(2)精英觉醒：(3)现代试验：(4)政体变革与资本主义道路：(5)国家统一与官僚资本主义道路：(6)社会革命与共产主义道路。(7)重构国家。

一、帝国伤口

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中，“帝国伤口”这个命题主要是通过由表及里的四个层次得以逐步展开的。第一个层次是“面子伤口”，即礼仪之争，这是不致命的，甚至对帝国的肌体都没有伤害。礼仪之争中最极端的是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拜见乾隆：清朝人规定马戛尔尼需要三拜九叩，下跪。这一次外交事件最终演变为对“跪还是没跪”的闹剧式细节追问——如果一个国家

已经达到了一种对诸如此类的外交细节事无巨细的关注程度，那么这个国家肯定存在着问题，因为这些细节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间利益的交往，而第二个层次——“肌体伤口”主要指的是鸦片战争与条约体系，第三个层次——“尊严伤口”指的是甲午海战，第四个层次——“致命伤口”则指的是国家失败，从甲午海战发生的1894年，到中国GDP超过日本的2010年——中国用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实现了翻转。



图2.1陈旭麓及其《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书影

陈旭麓先生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指出：“炮口下的震撼不仅是一种精神冲击，而且使西方人的意志借助于战争的胜利而成为近代中西之间的第一组条约。随后的一百余年里，中国和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多达一千多个，条约的网络编成了所谓条约制度：外国人通过条约‘合法’地剥夺榨取、管束控制中国，驱使中国社会脱出常规，改道变形，这个制度的起点正是鸦片战争后的第一组条约。”“这也是费正清(JohnK.Fairbank)等许多外国学者和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对外关系时分析出的一个重要阶段，即“条约体系”阶段，”面对如此残酷的条约体系，只靠个体，家族或者某一功能性组织、某一阶层的崛起，是无法撼动的。最终的结果是：这一千多个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55页，

。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不平等条约只能依靠国家力量的崛起来彻底终结，

可以说，甲午海战标志着东亚国际关系的反转，历史学家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表示：“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两个从事现代化历一代人之久的国家间的一场重大较量，在陆上。日本在平壤把李鸿章的淮军打得落花流水，在海上，中国的境况更为悲惨，……日本当时已是一个现代国家，民族主义意识使政府和人民团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国在战争中所面对的是日本民族团结一致的力量，在中国，政体基本上仍处于中世纪式的，政府与人民各行其是，战争压根儿没有影响到普通民众，这场战争几乎全是李鸿章的北洋水师与淮军在作战，西方观察家就精辟地将这场战争称为李鸿章一人与日本之间的战争。”“可见，日本当时的现代化已经成功，而中国这一代人三十年的自强基本上是失败的，顾炎武先生曾系统地阐述了这一现象，老百姓之所以对当时的国家存亡不关心，是因为当时是“亡国”，而非“亡天下”。华东师范大学的著名学者杨奎松先生认为，中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直到抗日战争才得以觉醒，“甲午海战对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前的中国现代化学习西方，甲午战后开始学习日本，梁启超是代表知识分子群体之转变的主要人物之一，他表示甲午海战的失败给了中国知识分子以极大的刺激：“日本与中国同处亚洲，同文同种，情势风俗相近，易于仿行。以日本为中介师法西方，”“在研究日本时，人们的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一个问题：中日之间在地理上，文字上如此之近，为何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差别如此之大？而从政治界来看，日本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也不可谓不深远，中国近代以来留学日本的著名人物有周恩来、鲁迅、郭沫若、李大钊、陈独秀、蒋介石、郁达夫、李叔同、秋瑾、蒋百里、陈寅恪、周作人、王国维，汪精卫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第271-273页，

杨奎松：《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

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等——这些人与留学欧美的人情况不同，他们都直接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历史进程与意识形态，而留学欧美的人则更多专攻于科技，

在中国现代化的研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关于现代化动因的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动因首先不是单一的“冲击—回应”模式，“其次也不是一厢情愿的“中国中心观”这样非此即彼的关于中国现代化动因的判断，背后的哲学基础都是“一分为二”思维逻辑的体现；而在“一分为三”的视角下，中国现代化的动因则呈现出这样一种面貌：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论的指导下，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乃是一个外部压迫下的民族危机转化为自身主动探索的积极过程，无论是近代以来的有限现代化还是当代中国的整体意义上的现代化。都是在与世界的对接中，形成了自主性的现代化行动。“民族危机转化为积极行动”的变化是不容小觑的，因为许多民族都存在着民族危机，然而它们未必都能转化为一种积极的行动，譬如非洲、印度等国家的民族危机都未转化为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积极行动，

二、精英崛起

有一些学者批判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明清之后进入到了“奴性化”的阶段，这样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如果简单地使用“奴性化”来概括明清以降知识分子的特征，那么为何会出现顾炎武，黄宗羲以及近代以来一大批如鲁迅这样的学者？中国的知识分子确实在中国文化中开辟出了一条中庸的道路，他们有一个特点。即无论受到多大委屈，他们都不会讲述、抱怨，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和精英群体的基本特征是道、学、政三者相统一——“道”是指天道，即一种价值体系；“学”即学问；“政”即服务于统治者和国家，

费正清，邓嗣禹，《钟击与回应，从历史文献看近代中国》，陈少卿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杜维明、《道·学·政，儒家公共知识分子的三个面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中国历史从乾隆时期的“独尊时代”到被称之为“觉醒时代”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转折，是精英崛起最为形象的展现—值得注意的是，其并非人民的觉醒，而是精英的觉醒。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的觉醒则是在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之后，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长才逐渐进入历史舞台中央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可爱的群体，他们与国家的关系，他们赖以立身立心的知识资源，以及他们自身的特质，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所构成的人类文明舞台上，都是难得一见的。虽然中国传统中直接孕育现代化的思想资源是极为稀薄的，然而传统思想提供的知识世界，艺术世界与思维方式在终极依据上，与现代知识具有潜在的相通性；依靠传统思想武装和养育的文化精英，一旦实现向现代的转化，便具有超强的接纳现代知识的能力与禀赋。



图2.2沈周《京江送别图》

中国知识分子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可以分为多种类型，像明代的大画家沈周一生没有参加科举，一辈子没有功名，但这丝毫不会影响他在当时知识界甚至政治界的地位。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类型分化就更加快速了。尤其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商业家和实业家这些精英群体的崛起，成为最为靓丽的历史风景线，我们关注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有一个其他国家不曾有过的现象，那就是在海外有所成就的知识分子渴望回国效力，在海外有成就的企业家在改革开放之后纷纷回国投资，在华人心目中，我们感觉国家情怀类似其

他文明的宗教信仰，是铸造人生价值的精神支柱和终极寄托。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王庚武先生曾写过一本名为《天下华人》的书，其背后就有着对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中国发展之联系的关切。苏基朗为该书撰写的序言的题目——古今生民命，天下华人心，可以印证我们以上的判断，“譬如，在2024年8月逝世的李政道先生，在去世之前就交代子女，关于自己的纪念活动都在“祖国”举行，他并非如许悼云先生用“母国”这个词，而是祖国——李政道先生也是典型的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代表。

精英觉醒也意味着中国的社会精英从单一类型向多元类型开始转变，费孝通曾表示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是文字塑造的权威，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是缺乏实践能力的阶级。其实，中国知识分子的面貌并非完全如此，总体而言，中国知识分子与精英人物是通过义理、考据、辞章和书画支撑起来的群体。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明代的沈周，他的书画支撑了读书人的精神世界，书画就是中国文人的“圣经”。我们一直有这么一个坚定的看法，那就是像中国这样一个能够通过一幅画将宇宙之美压缩到一幅画上的民族，一定是了不起的民族，例如，《三国演义》对中国的影响之所以超过《三国志》，是因为一个民族的秘史不是藏在诸如《三国志》这样的正史里面，而是藏在文学作品之中，由此可见，古代中国的知识精英的类型已经有分化的迹象，尽管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掌握义理之学的正统学人，但这并不能否定像沈周，罗贯中，蒲松龄这些边缘知识分子的影响，后者甚至在更深层次上塑造了民族的精神，书写了民族的秘史，

当然，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精英分化呈现出加速度的演进，这自然是时代使然，近代以来的精英类型可以划分为五种：第一种是中兴精英，包括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之所以称之为“中兴精英”是因为他们还生活在传统的轨道上以捍卫和兴盛原有江山为己任；第二种是改良

。王庚武：《天下华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

精英，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等；第三种是救亡精英，包括詹天佑，张謇，丁文江等，第四种是启蒙精英，包括胡适、鲁迅等。第五种则是革命精英，包括孙中山、毛泽东等。

美国头号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的得意门生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一曾经写过一本名为《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的书籍，“她将“同治中兴”这段历史放在19世纪后半期20世纪前半期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这个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并试图发展费正清的“冲击—回应”理论模式，着重论述中国社会内部如何做出回应，她将转变的“内因”化约为儒家文化的作用，即儒家文化是如何影响和决定着“同治中兴”的中坚人物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和社会精英——士绅们的生活、思想和行动，如何影响和决定了“中兴”的各种政策和措施，如何影响和决定了“中兴”的失败，芮玛丽将同治中兴这段历史概括为“中国保守派的最后抵抗”，其实就是指儒家文化的最后反抗——这里“最后抵抗”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精英觉醒”，在她看来，儒家轻视商业和产业。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是命定不能步入近现代社会的，真正能将中国带人现代化轨道、带入现代世界的，一定不是中兴精英，而是被新思想和新意识形态武装起来的新型精英，

三、现代试验

在清朝灭亡之后，近代中国上演了一系列的现代试验，包括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新村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读互助主义、科学救国论、教育救国论、实业救国论等等，但却都失败了，原因是什么？

首要的原因是这些现代试验都“无把握主要矛盾之能力”。当时的主要矛盾实际上是外国压迫与中国独立自主的国家发展之间的矛盾，然而，当时

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房德邻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很多知识分子并不认为其是主要矛盾，只有毛泽东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是当时的主要矛盾，他有一个经典的表述，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与‘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能够人木三分地揭示这一时代主要矛盾的人，在当时还不多见。就是毛主席的这一观点，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并不认同。

第二个原因是这些现代试验都“无历史现重建之能力”，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其帮助中国共产党解决了历史观重建的问题。譬如吕思勉先生从“三阶段论”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析—部落阶段，封建阶段，郡县阶段—这也是一种历史观，中国共产党则有着自己的一套历史观，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所提供的理想社会设立了一个历史中的神圣彼岸，这一神圣彼岸与现世的张力激励或要求每一个人的献身。”这两大原因直接决定了所有现代试验注定是无整体革新之能力，无长远支撑之能力、无动员人民参与之能力，既然是在以上五个方面都存在着致命的短板，现代试验均以失败而收场也就在所难免了。

四，政体变革与资本主义道路

按照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家周振鹤先生的说法，中国历史上有两大政体变革，一个是从封建制到郡县制，另一个是从君主制到共和制。“在完成了君主制到共和制的转变之后，中国社会在1911年到1937年之间出现了一个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精英人物的成长速度非常快，然而，我们注意到了这个时期隐藏着一个诡秘而又残酷的事实，那就是：这个时代只有精英的觉醒而没有人民的觉醒，只有精英的幸福而没有人民的幸福，

法国汉学家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说道：“中国目前将现代化置于革命之上的做法，促使我意识到必须重新估计中国资产阶级在20世纪历史进程中的贡献，并将长期以来教条地把革命和现代化混为一谈的现象加

刘小枫《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23页。
。周振鹤：《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页。

以澄清，日本和其他新型工业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的成就表明，经济腾飞完全可以不经社会和政治革命的途径来完成。尽管从长远来看，这种腾飞会导致社会革命和政治制度的变革，诚然，中国资产阶级在革命实践中所起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但正是这个阶级，最早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经济现代化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数十年的历程中，它认真地探究着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寻求并实践了各种可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说，在白吉尔看来，中国应该依靠资产阶级而不是依靠人民进行经济建设与现代化，故在他眼中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然而需要思考的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革命”与“现代化”两者基本是一体的，然而，白吉尔却认为，革命与现代化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要分开讨论。1911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有趣的一段时间，凡是这段时间所呈现出来基本都是一种美丽的文化想象，即达官贵人们所展现出的富丽堂皇之气象，所以在白吉尔看来，民国时期的最初十几年(1915-1927),是中国资产阶级鼎盛发展的十几年—1927年以后，资产阶级日益受到国民党官僚阶层的压制和归并，在国家处于一盘散沙的前提下，资产阶级体现出一种充满活力的自发精神。同时，白吉尔也意识到了自己观点所存在的问题。因此他做了一个补充：资产阶级的失败说明没有国家力量亦无法建立保障国民经济发展的机制，第一次现代化运动所取得的成效，并未导致产生一种新的发展策略，

南通实业家张謇即代表了一种新型的觉醒精神，他是清朝末年的科举状元，发现义理、考据、辞章无用，于是决定实业救国，这也是当时作为资产阶级的教国精英之群像。在经济落后、政治分裂、并严重依赖外国的环境里。单靠市民社会是难以完成艰巨的现代化任务的，只有国家才能建立起各种制

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张富强，许世芬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5页，

。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张富强，许世芬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1页，

度机构，从而保障国内和平和公共秩序——这是白吉尔对他理论的一个修正、一个辩护，但她仍然认为资产阶级应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力量，这一观点提出的背景是改革开放后以荣毅仁为代表的红色商人的崛起，故在当时的白吉尔看来：中国的资产阶级似乎有一个一脉相承的脉络，



图2.3张謇像

总之，近代以来，随着王朝政权所赖以生存的各种生态环境的改变，与古代政权相隔绝的新型要素逐渐生长、蔓延开来，其中由君主专制转向共和体制，乃成为中国制度变革的重要象征。当然，这场革命对于古老的中国来说是不彻底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意味深长地说：旧制度崩溃了。但共和派革命竞人之混杂的集团却并未对此作出过真正贡献，仅仅充当了无足轻重的支持力量，1911年的“辛亥革命”并不像大家为了把它纳入到固定的历史模式中而声称的那样是一种“资产阶级革命”，而仅仅是中国政权解体的一个简单插曲，孙文辞去大总统一事本身就暴露了这个根本没有兵力和收入的共和国的极端软弱性，归根结底，在一些政治难民的帮助下，这个共和国只不过是抛弃了由北京政府组成的中央政权之虚假权力的绅士们的旧省议会的延续，”袁世凯短暂的专制及其帝王梦的破灭，直接导致了进入武夫当国的时代。私人军队的崛起和军事集团的登台使得国家被彻底分割，由于近代以来中国所处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和混杂迷乱的

谢和耐。《中国社会史》，耿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8页。

国内局势，依托单纯政体变革和资产阶级进行的现代突破是难以完成的。政体变革的局限性与资产阶级固有的局限性，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是相当不完备的，甚至都难以达到触动表层社会结构的功效，更不用说人民的幸福与安康了。

五、国家统一与官僚资本主义道路

国民党统一中国之后，走上了一条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是国民党政权性质所决定的，这条现代化道路在起点上就是错误的，错误的起点只能孕育错误的结果，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如下，(1)国家建设层面上，是十分脆弱的国家统一体系，即一种依靠类似古代的盟誓制度来实现的国家统一，其有着天然的脆弱性一面中国共产党实现国家统一依靠的是组织的力量；(2)空间层面上，国民党政权的性质是城市政权与口岸政权；(3)在阶级属性上，是上层阶级的政权，(4)在组织维度上，是跛脚的政党政权，(5)在意识形态上，是新旧思想组装的政权——这体现在蒋介石崇尚礼义廉耻与皈依基督教之间的纠结；(6)在权力维度上，是以个人忠诚为纽带的领袖制。

尽管蒋介石借助革命力量和古老盟誓制度的混合实现了表面上的统一，但军事集团对国家的分割以及真正的国家独立和国家构建并没有完全得以铺开，特别是蒋介石在1921年推行清党运动之后，它与传统统治阶级和新型财富集团的结盟，使其彻底丧失了变革中国社会的动力。其成功之处充其量是以对银行系统越来越严密的控制而确保了该政权的财政平衡，“众所周知，现代中国已经拥有了相对复杂的阶级结构，它已经完全突破了梁漱溟所说的“士农工商”“职业分途”的结构，正是这一阶级结构充当了政党赖以诞生的社会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不同政党与不同阶级的联结，不同政党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以及不同政党对不同阶级的动员，直接导致了日后不同政党的走向与命运，最为明显的就是国共两党之阶级基础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其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
。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888052052033007003>